

## 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一個海歸者的足跡

◎ 閻小波

張禮恆：《從西方到東方——伍廷芳與中國近代社會的演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對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大陸型國家來說，在通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客觀上給海歸派留下了一定的活動空間。但海歸派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所作為，不獨取決於時代所留空間的大小，還要看其能否在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個人與國家之間找到一個交合點。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海歸者不絕於途，他們雖非個個有雄才大略，但均抱入世的精神，為國運、民瘼而奔走呼號，然而在歷史的大舞台上成為悲劇人物的卻不在少數。「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闈，因封閉保守的傳統文化，導致他以「悲劇」收場（石霓：《觀念與悲劇——晚清留美幼童命運剖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深受外來觀念影響的王韜「在更為廣大的中華世界中居於極端邊緣和十分脆弱的地位」（柯文[Paul A. Cohen]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序言」）；有「西學聖人」之稱的嚴復，在尋求富強的道路上，最後十年卻「背離西方退回傳統」（史華茲：《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張禮恆博士的新作《從西方到東方——伍廷芳與中國近代中國社會的演進》向讀者展示了伍廷芳這位海歸者所走過的一段與眾不同的心路歷程。

西方漢學家很早就意識到中國沿海與內地的差異，柯文稱其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未曾研究的巨大的研究課題」。以世界的眼光看，西方列強不斷衝擊中國；以中國的眼光觀之，沿海不斷地衝擊著內地。研究這兩種衝擊都離不開對文化邊緣人群體的分析。伍廷芳作為沿海文化的產兒，在從東方到西方、又從西方到東方的人生道路上時刻感受到這種文化衝突，但中西文化及綜合國力的巨大落差，並未使他陷於苦悶而無法自拔，也沒有像其他「邊緣人」那樣要麼回歸傳統、要麼因個人價值與現實世界間的緊張關係或淪為現實政治的犧牲品，或避走他鄉。

伍氏生於南洋，長於廣州、學於香港，後又取得英國林肯法學院博士學位。1877年返港，先後成為第一位華人大律師、立法局的首位華人議員。以伍氏的教育背景、學養、風範，若繼續在港謀發展，定能成為港島的華人領袖。但改寫了香港華人歷史的伍廷芳，不可能打破港島的華洋畛域。伍氏在一樁華洋之間訴訟案的失敗，與其說是使作為辯護律師的他對西方價值發生了信仰危機，不如說是使他更為真切地感受到個人命運與民族興衰之間的內在聯繫。

伍廷芳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在駐英公使郭嵩燾、駐美公使陳蘭彬、直隸總督李鴻章競相羅聘之際，伍氏於1882離港北上，入李鴻章麾下，襄辦洋務。在伍氏長達十四年的幕僚生涯中，參與了李鴻章經手的所有重大外交及興辦洋務的活動，深得李氏信任與賞識。隨著其活動空間擴大，特別是政績斐然，一個邊緣人正越來越接近權力中心。甲午戰敗向被視為李鴻

章一生中最大的敗筆，然而，介入中日馬關談判，並出任「換約大臣」的伍廷芳升遷的勢頭未減，旋即赴美出任公使（1896-1902），其間為保護華僑、維護國權做出了重大貢獻；1903年回國後，他先後任修律大臣、外務部右侍郎等要職，為推進中國法制現代化及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殫精竭慮，成為朝中不可多得的通才。

奇怪的是，仕清二十八年的伍廷芳並未成為大清王朝的殉葬品。武昌起義爆發後，革命黨人邀銷差居滬的伍廷芳出任滬軍都督府外交總長，他主持與北方代表唐紹儀旨在終結大清王朝的南北議和，並以和平方式終結了他曾為之效力的大清王朝。

以外交見長於晚清政壇的伍廷芳，在孫中山的新內閣中並未被委以外長的重任，孫中山任其為司法總長，而外長一職給了年僅三十一歲、在外交上尚無建樹的留美博士王寵惠。伍氏對此雖然不滿，但仍從大局出發，並動員廣東商團資助臨時政府。在司法總長任內，為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伍氏堅持司法獨立，並圍繞兩起命案同居功自傲的滬軍都督陳其美展開了長達三個月的「權法之辯」，開啟了近代中國法律至上、「權」必須讓位於「法」的先例。因有此芥蒂，做人辦事一向堅持原則的伍廷芳其後一度疏遠革命黨人自在情理之中。

遠離政治旋渦的伍廷芳並不隱瞞自己的政見。1913年他對革命黨人的「二次革命」表示異議，並公開反對袁氏稱帝及張勳復辟。在對北洋政權失去信心之際，伍氏再度選擇孫中山，1917年出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外交總長，1922年伍氏在廣東省長任內走完了八十年的人生旅程。

伍氏與中國近代史相伴的一生，雖不能說是波瀾壯闊，但其政治上由邊緣走向核心的上升之勢始終未改，這在文化邊緣人群體中並不多見。其緣故正是該書作者探求的要旨。作者以傳主的經歷為主線，以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為背景，將其放在近代東西文明碰撞、交流的宏大視野中，全面考察、分析了伍廷芳的歷史功過、是非得失，提出伍廷芳走過了一條從東方到西方，再從西方到東方的心路歷程，演奏了一首雙重變奏曲，從而部分修正以往西方漢學家以西方為中心的「衝擊—反應模式」。

從東方到西方，就文化邊緣人來說是一個離異傳統的過程；就近代中國而言則是面向世界、回應西方的過程。這固然是文化邊緣人及近代中國歷史的主脈，但並不是唯一的或排他的。就傳主的歷程而言，的確還有一個從西方到東方的過程，但與前一個過程相比可能顯得更加曲折艱難，且不為學界所關注。因為這既不是簡單的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和對西方文化的揚棄，而是一個既不失自我又能找到中西方文化交合點的過程。

伍氏不像梁啟超等人那樣，在少年時代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他是通過小說、史鑑等來接受傳統文化，正如作者所言，這「為他接受西學教育提供了一個不壞的基點，便於對異質文化的認同」。伍氏從十四歲起便接受正規的西式教育，對傳統文化的離異從此開始。從英國返港後，身為西化知識精英的他，畢竟生活在華人圈內，從此開始了他從西方到東方的歷程。

作者將1882年伍氏仕清前稱為其人生中的落筆階段，他說：

在其知識學養中，西學明顯多於中學、開放性強於封閉性、世界性勝於民族性。西學知識鋪墊了影響其終生的思想根基，鑄就了其文化邊緣人的本質特徵。……比照西方模式，改造中國社會，成為伍廷芳終生不渝的政治理念。

在其後的仕清二十八年裡是其人生的運筆階段。作者對之有如下描述：

〔伍廷芳〕懷著實踐其政治抱負的宏大理想，以一個文化邊緣人的角色，新型官員的身份，從事薦西學、築鐵路、辦外交、改法制等實踐活動，且取得了斐然的成就。此階段，既是伍廷芳在晚清政壇初顯崢嶸的時期，又是伍廷芳向傳統文化回歸的時期。

此間，伍氏還從一個文化邊緣人的視角，對中西文明的優劣進行了全面的比較。他以逸出傳統文化始，以高揚傳統文化止，但其逸出與高揚既非嚴復式的，更非辜鴻銘式的，又非孫中山式的，而是：

以西洋文明為參照系，以救亡圖存為急要，反思甄別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與劣，既充分肯定傳統文化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繁衍昌盛史上的重要作用，始終不渝地堅持民族文化的精華、特色必須固守。同時又從「長時段性」的發展觀出發，主張傳統文化的弘揚與剔除，必須以能否拯救民族的危亡為前提，以是否與人類文明的總體發展趨勢相契合作標準。

表現在政治理念上即是主張通過漸進改良的方式，創建一個崇尚司法獨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這就是他雖有幾十年的洋務生涯，但不能稱其為洋務派，雖在經歷上有極大的相似性，但其中西文明觀卻與辜鴻銘迥然不同，雖也嚮往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但在實踐手段上卻同孫中山革命黨人存有歧異的根源所在。民初十二年是其人生的收筆階段。清政府的愚頑、時代大潮的湧動，促成了伍廷芳思想的巨變，使其思想跨越了改良、立憲的樊籬，邁向了革命、共和的大道，實現了其思想的第二次飛躍。在辛亥革命以後的十年間，伍廷芳思想雖有一段相當長時間的起伏、波動，但實現共和民主的理念始終未變，且愈益堅定。至於一度疏離孫中山革命黨人，親近南北軍閥，此正是文化邊緣人特質的顯現，即試圖在多邊力的選擇取捨中，實現其終生未改的政治理念——建立一個公平、正義、尊法的民主共和國。而事實上，伍廷芳正是在這種比較、甄別中，拋棄了南北軍閥，心悅誠服地皈依於孫中山革命黨人的旗幟下，直至生命結束，實現了其思想的第三次飛躍，達到了文化邊緣人在近代中國的最高峰。

伍氏的從西方到東方的人生旅程給人們留下了甚麼啟示呢？作者在結語中提出發人深省的三點：一是文明價值的兩重性——殊別價值與普世價值；中國文明重建的原則——民族性與世界性的和諧統一；孤獨與前驅——社會轉型期中的文化邊緣人。在該書的最後，作者很有見地的提出：

在近代東西兩大文明碰撞、裂變中孕生的文化邊緣人，其價值與地位在歷史的「長時段性」中愈益彰著。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近代化史就是一部由文化邊緣人擔綱的歷史。伍廷芳等文化邊緣人代表了不同階段和不同時期中國社會的整體走向，昭示著近代中國的演進趨勢。百餘年來的歷史表明，傳統社會對文化邊緣人的排拒與吸納，決定著中國近代化的艱難與順利；文化邊緣人數目的多寡與中國近代化的程度恰成正比。

凡此對當代中國的文化邊緣人（海歸派）及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來說，當不無啟示。